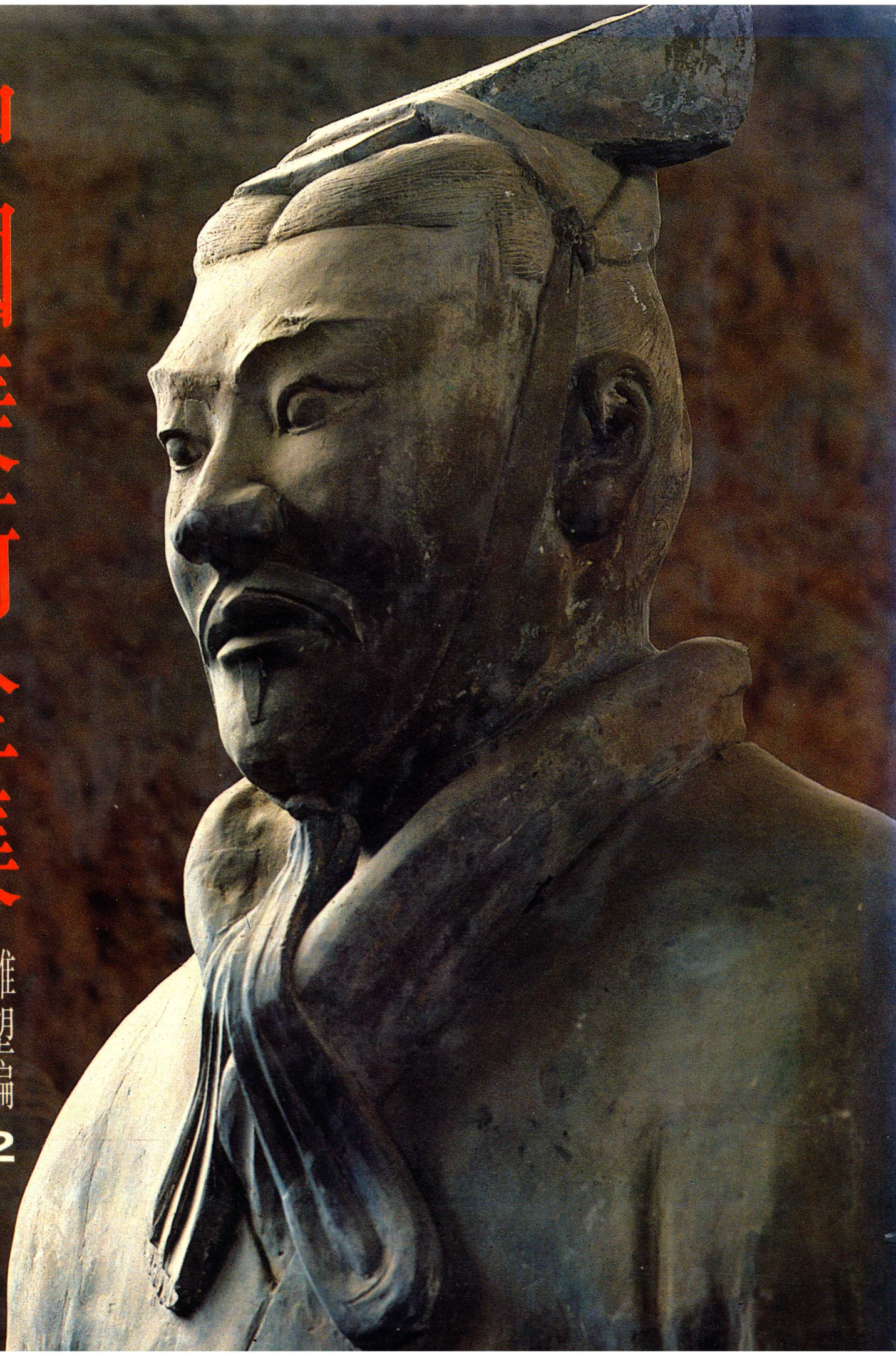


中國美術全集

秦漢雕塑

雕塑編 2



中國美術全集



中國美術全集

雕塑編 2 秦漢雕塑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本卷顧問

王子雲

史岩

劉開渠

王朝聞

主編

傅天仇

副主編

湯池

劉興珍

出版者

人民美術出版社

(北京北總布胡同三十二號)

責任編輯

劉玉山

設計

陳允鶴

李文昭

圖版攝影

張祖道

製版者

北京新華彩印廠

排版者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

裝訂者

北京新華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編號 八〇二七·九五八六

國內版定價 一〇〇元

版權所有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中國美術全集

雕塑編 **2** 秦漢雕塑

本卷顧問

王子雲 西安美術學院教授

史 岩 浙江美術學院教授

劉開渠 中國美術館館長

王朝聞 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 研究員

主編

傅天仇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副主編

湯 池 中央美術學院副教授 美術史系副主任

劉興珍 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史研究家

凡例

一 《中國美術全集》分繪畫編、雕塑編、工藝美術編、建築藝術編、書法篆刻編五部分，每編分若干冊。

二 本卷爲雕塑編第二冊：秦漢時期雕塑。這一時期的青銅器、玉器、畫像磚石等因分別編入各自專冊，故本卷只選其中個別有代表性而雕塑特點較強的作品，以反映此期雕塑藝術全貌。

三 雕塑作品大都沒有作者署名和確實的制作時間。本卷依秦、西漢、東漢三個歷史時期，每一時期按石雕、畫像浮雕、陶俑、銅雕及工藝雕塑等類，進行編排。

四 本冊內容分三部分：一爲概述，二爲圖版，三爲圖版說明。年表、索引及總目等，將綜編爲全集的一個專冊。

秦及西漢時期的雕塑藝術

湯池

秦始皇，從公元前二三〇年開始，經過十年時間，擊滅韓、趙、魏、楚、燕、齊等六個諸侯國，於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二十六年）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大業，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秦朝。國家的統一，財力與人力的集中，為雕塑藝術的繁盛，開闢了廣闊的前景。

秦代的雕塑藝術，是密切地為宣揚統一功業、顯示王權威嚴服務的。在建築裝飾雕塑、青銅紀念雕塑、墓葬明器雕塑等方面，都取得了極其輝煌的成就。

從戰國中朝秦孝公任用商鞅、實行變法之後，秦國鄉邑大治，國力迅速發展。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三五〇年），都城由櫟陽徙至咸陽。至戰國晚期，秦國在建築裝飾雕塑方面，取得了若干引人注目的成就。據《三輔舊事》記載，秦昭王時，修建了跨越渭河的橫橋（亦稱渭橋、石柱橋），在橋之北端，曾雕刻一尊付留神石像，以為裝飾。又據傳說：秦昭王時任蜀郡太守的水利工程家李冰，于建造都江堰過程中，曾雕刻一件石牛，用作鎮水「壓勝」之物。此外，從陝西鳳翔斬年宮及大鄭宮遺址出土的奔鹿紋、雙獸紋圓瓦當來看，其藝術水平亦比齊臨淄、燕下都出土的樹木對獸紋及饕餮紋半瓦當高出一籌。

秦始皇執政之後，即致力於都城咸陽的擴建。據《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即在渭河北岸營建「六國宮殿」。這項集大成的建築工程，與其說是為了滿足統治者奢華享樂的需要，不如說是為了標榜秦始皇統一六國的決心。通過考古工作者的多年努力，在今咸陽市東郊窰店鎮東北，已經探明咸陽宮的宮城和主體建築的大致範圍。



戰國晚期的秦國瓦當

雙獸紋瓦當(大鄭宮遺址出土)

奔鹿紋瓦當(斬年宮遺址出土)

秦代瓦當

鹿鳥昆蟲紋瓦當(咸陽宮遺址出土)

四鹿紋瓦當(阿房宮遺址出土)

四獸紋瓦當(阿房宮遺址出土)

子母鳳紋瓦當(阿房宮遺址出土)

瓦當是強烈反映時代藝術風格的建築裝飾構件。秦咸陽宮出土的瓦當圖案，樣式繁多，紋飾精美。其中最新穎活潑的，是由鹿、鳥、昆蟲等浮雕紋樣組成的圓瓦當；此外，秦阿房宮遺址還出土四鹿紋、四獸紋、子母鳳紋圓瓦當。比起鳳翔斬年宮及大鄭宮出土的動物紋瓦當，秦代瓦當的內容更加豐富，構圖趨向飽滿，風格益加華麗。在咸陽故城一號宮殿遺址，還發現兩種花紋空心磚，一種是刻劃着龍紋或水神「禺彊」形像的空心磚，另一種是模印出回紋及菱形紋的空心磚，用作宮殿壁面、台階及地面的裝飾，以增加宮殿外觀的藝術美。上述情況表明，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建築裝飾雕塑有了新的發展。

秦代在玉石雕刻方面的成就，也頗可觀。據晉王嘉《拾遺記》卷四記載：「始皇元年（公元前二四六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一作烈裔）。刻玉為百獸之形，毛髮宛若真矣」。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為了適應政治形勢發展的需要，對秦昭王時期修建的橫橋，進行加固擴建。在施工中，因「重不能勝，乃刻石作力士孟賁等像」〔一〕。又據《三輔黃圖》「五柞宮」條記載，驪山秦始皇陵園，曾雕刻兩件「頭高一丈三尺」的石麒麟，開漢代陵墓前雕造石辟邪之先河。

秦代有大型青銅紀念像的鑄造，這在雕塑史與冶金史上，都是空前未有的創舉。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記載：「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太史公自序引賈誼《過秦論》亦曰：「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長期以來，由於實物資料缺乏，人們主要依靠文字訓詁材料來討論問題，所以對何謂「鍾鐻金人」的理解頗不一致：有主「鍾鐻金人」為一物說者，有主「鍾鐻、金人」為二物說者，更有主「鍾、鐻、金人」為三物說者〔二〕。自從一九六四年江蘇六合程橋春秋晚期吳墓出土兩件鍾鐻金人〔三〕，特別是一九七八年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六件鍾鐻金人〔四〕之後，「鍾鐻金人」為一物之說已獲確證〔五〕。太史公所說的「鍾鐻金人十二」，就是做成銅人模樣的十二件鍾鐻。考慮到秦代實行「數以六為紀」〔六〕的制度，恰好與曾侯墓出土之曲尺形雙層編鍾架共用六件鍾鐻金人相符，那麼，放置在秦咸陽宮（即「廷宮」）的十二件鍾鐻金人，可能是供兩具曲尺形雙層編鍾架上使用的。

另據《漢書·五行志》記載：「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是歲始皇初并六國，反喜以為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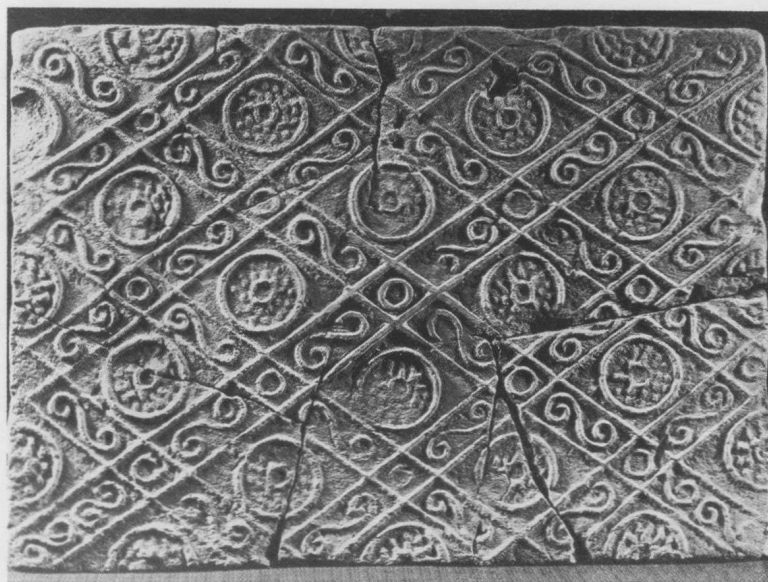
張衡《西京賦》所謂「高門有閤，列坐金狄」，就是指這十二個身着「夷狄服」的大銅人。酈道元在《水經·河水注》中，還說這十二個大銅人，胸前刻有李斯撰寫的讚頌秦始皇統一功業的銘文，「各重二十四萬斤，坐之宮門之前，謂之金狄」。《三輔舊事》對這十二個金狄的安置地點，說得更加具體：秦代「立在阿房殿前，漢移長樂宮大廈殿前」。據此，這十二個「坐之宮門之前」或「立在阿房殿前」的銅人，名曰「金狄」，與前述「置廷宮中」的十二個「鍾鐻金人」，不僅安置地點不同，名稱也相異，實難按一物二名去理解。這批金狄的椎毀經過也有案可稽：東漢末年（漢靈帝時），董卓作亂，其中十件被椎毀以鑄小錢^{〔七〕}。所剩兩件，到十六國時，被後趙石季龍徙至鄴，不久，又被前秦苻堅運回長安銷毀掉^{〔八〕}。這批金狄是否「各重二十四萬斤」，今已無從考定。然而，從「魏明帝欲將詣洛，載到霸城，重不可致」^{〔九〕}的情況來看，其體積異常巨大是肯定無疑的。

秦代鑄造形體高大的「鍾鐻金人」及「金狄」，配置在咸陽宮中及阿房殿前，使巍巍壯麗的宮殿與金光閃閃的銅像交相輝映，其藝術功能——體現王權威嚴的精神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中國古代在葬禮中使用「像人」明器，其歷史非常悠久。但是，大量地製作「像人」的陶俑、木俑或銅俑，是在奴隸制崩潰、封建制興起的春秋戰國時代，即新興地主階級提出廢除人殉制（即「止從死」）之後。《韓非子·顯學》有「像人百萬」之語，足見戰國晚期製作偶人風氣之盛。在大量的藝術實踐基礎上，戰國晚期已經有人運用樸素淺顯的語言，進行人物頭像雕刻經驗的總結。例如《韓非子·說林》引桓赫的話說：「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被譽為「世界第八奇跡」的秦始皇陵兵馬俑，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出現的。

秦始皇陵座落在陝西省臨潼縣驪山北麓。《史記·秦始皇本紀》記其營建經過曰：「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梓，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

據《皇覽》記載：「始皇陵坟高五十餘丈，周圍五里餘。」現存之封丘呈覆斗狀，高七十六米，佔地面積約十二萬平方米。經勘測，陵園周圍有內外兩道城垣，四面皆設門^{〔一〇〕}。以往，在陵區內曾出土一種相當于圉人（馬丁）身份的陶坐俑，高約六十五至七十二厘米不等，身着交襟長衣，



秦代花紋磚 左：模印菱形紋鋪地磚 右：刻劃龍紋空心磚(殘) (咸陽故城一號宮殿遺址出土)



春秋戰國時期的鍾鐻金人 (左：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 右：江蘇六合程橋春秋晚期吳墓出土)

造型嚴謹，神態端肅，服飾有較強的質感。

一九七四年三月，在秦始皇陵東垣外約一千米處，于東陵道北側，臨潼縣晏寨鄉西楊村農民在挖井過程中，發現一座埋藏秦代大陶俑的從葬坑（一號坑）。隨後由陝西省考古所進行勘探試掘，探明一號坑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二三〇米，南北寬六十二米，總面積達一萬三千平方米。坑內作土椁與巷道櫛比相間佈局，東端有開闊的前廳，巷道與前廳部份，整齊有序地埋藏着與真人真馬等高的兵馬俑，按其密度推算，總數達六千餘件。這是中國考古史上空前重大的發現，舉世為之矚目。

一九七六年夏，在一號坑北側，又發現規模較小的二號和三號兵馬俑坑。三坑埋藏兵馬俑的總數，估計超過七千件。現已出土各類武士俑一千四百餘件，鞍馬二十九匹，拉車的陶馬一百餘匹，木質戰車二十輛（二）。

從各坑的結構形制及所藏兵馬俑的裝備情況來看，一號坑象徵着以戰車和步兵混合編組的主體部隊；二號坑為弩兵、戰車、騎兵穿插組成的混合部隊；三號坑是統領一、二號坑的軍事指揮部。它們是秦代禁衛軍的真實寫照；在總體設計上，擔負着守衛陵園的象徵職能。

為數衆多的陶塑兵馬俑，通過嚴謹的佈局，排列成面向東方、氣勢磅礴、威武雄壯的軍陣場面，再現了秦軍奮擊百萬、戰車千乘、軍容整肅、勇于攻戰的宏偉氣派，具有強大的藝術感染力。這是秦代造型藝術取得劃時代成就的標誌。

崇尚寫實、手法嚴謹是秦俑的主要藝術特點。秦俑及陶馬的體型，與真人真馬相等，形貌服飾皆嚴格地模擬現實。舉凡花樣繁多的髮髻、連綴甲片的皮筋、扣接革帶的帶鉤、綁紮腿部的裹腿、系在腳背的靴帶、穿納鞋底的針腳、馬身披掛的鞍轡等等，無不作出絲不苟的刻劃，處處體現陶塑匠師們創作態度的嚴謹，觀察生活的深邃和表現技巧的卓越。

性格鮮明、形象生動是秦俑的又一藝術特點。武士俑大致可分為軍吏俑、着甲步兵俑、輕裝步兵俑、立式弩弓俑、蹲式弩弓俑、騎兵俑、馭手俑等七類，皆分類模製成型，再經人工修飾而製成。每類之中，又有幾種不同的頭像模型。這種模製和手塑相結合的方法，既便於大批製作，又避免了多人一面之弊。作者通過對眉眼、鼻翼、嘴唇、鬍鬚等細部形像的刻劃，着重塑造將士

們堅毅勇敢、沉着機智、威武剛健的性格；同時，又通過不同的衣冠服飾，表現出不同的級別身份。在威武剛強的共性之中，還有各自的個性。例如：一號坑出土的一件按劍將軍俑，具有運籌帷幄、指揮若定的神態。二號坑出土的一件垂手將軍俑，作肅立注視狀，表現了治軍有方、凜然不可侵犯的氣勢。再如二號坑出土的一件蹲式弩弓俑，顯得格外機智勇敢。一號坑出土的一件着甲步兵俑，具有堅忍不拔的氣質，一件蓄鬚的輕裝步兵俑，顯得格外地風趣樂觀。

一九八〇年冬，在秦始皇陵封丘西側，發掘出兩乘鑄造精緻的銅車馬。出土時，作一前一後順序排列。兩車均屬單轅、四馬、一馭手的配置。所異者，前車爲傘蓋，馭手作立姿；後車爲篷蓋，馭手作跪坐姿。在後車的金屬轡繩末端，刻着「安車」二字，可能是仿照秦始皇出巡的御乘設計的。用銅鑄「安車」陪葬，紀念意義極爲明顯。

「安車」已經修復，形體約爲真車真馬的二分之一，總重量爲一千二百多公斤。銅馬高九十二厘米，姿態健壯，裝飾華麗。銅車結構精密，輓具齊全，梭格車窗敞閉自如，金屬轡繩宛轉靈活。馭手神情貫注，老成持重。兩乘銅車馬的出土，標誌着秦代的雕塑藝術與冶鑄工藝，具有極高的水平^{〔三〕}。由此可以佐證秦代鑄造「鍾鐻金人」及「金狄」的可能性，並可藉以想見其宏偉壯麗程度。

秦始皇爲中國的統一做出了貢獻。但是，由於他不惜民力，廣徵徭役，賦斂苛重，從而激化了當時的階級矛盾。秦二世繼位後，統治集團內部互相傾軋，政局動蕩，民怨沸騰。公元前二〇九年爆發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大起義，很快地推翻了秦王朝。

二

秦朝被轟轟烈烈的農民大起義推翻之後，項羽和劉邦展開了爭奪封建統治權的「楚漢相爭」。經過數年浴血攻戰，公元前二〇二年，項羽敗於垓下，劉邦取得勝利，建立漢朝，定都長安，史稱西漢。

西漢時期，是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封建國家得到鞏固和發展的時期，社會比較安定，經濟、文

化得到迅速發展。西漢的冶煉技術居於世界領先地位，為大型石刻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雕塑藝術的應用範圍更加廣闊，表現技巧進一步提高，在大型紀念性石刻、園林裝飾雕塑、各種明器雕塑、實用裝飾雕塑等方面，都有顯著的發展，留存至今的西漢雕塑作品，極為豐富。

西漢雕塑藝術的新成就，突出地表現在大型紀念性石刻及園林裝飾雕刻上。

漢高祖劉邦曾欣然採納蕭何提出的「非壯麗無以重威」^{〔一〕}的建築設計主張，重視宮苑的建築裝飾雕塑。但是，漢初財力有限，在營建未央宮和長樂宮時，還很少出現純供觀賞的大型裝飾雕塑。惠帝、高后、文帝、景帝時期，實行了休養生息、安集百姓的政策。到公元前一四〇年漢武帝即位時，社會呈現出繁榮富庶景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太倉之粟陳陳相因。」^{〔二〕}憑藉如此雄厚的物質基礎，漢武帝時期的大型紀念性雕刻與宮苑裝飾雕刻，猶如雨後春筍，蓬勃興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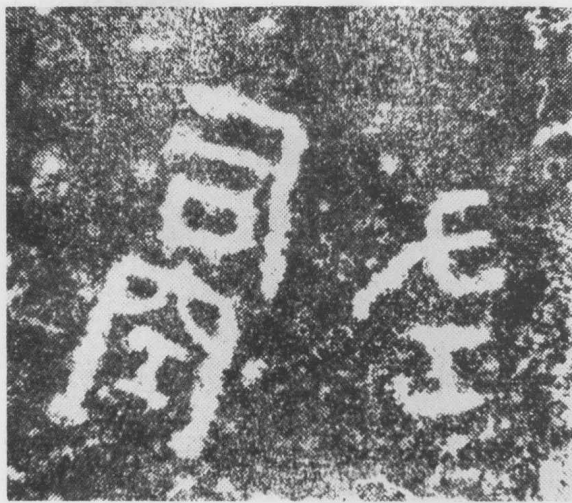
從史籍記載來看，漢武帝元封二年在上林苑築飛廉觀，觀上置銅鑄飛廉像；太初元年造建章宮，其北闕以銅鳳凰為飾；又造神明臺，臺上樹立「高三十丈，大七圍」的銅鑄仙人承露盤^{〔三〕}；在太液池的西北岸，分別雕造石鯢與石魚。

我國現存年代最早的一組大型石刻，是原存陝西省長安縣常家庄村北的牽牛像^{〔四〕}，和長安縣斗門鎮棉絨加工廠內的織女像^{〔五〕}。兩者東西間距約三公里。據《漢書·武帝紀》記載，它們是元狩三年（公元前一二〇年）在上林苑「發謫吏穿昆明池」時建立的。漢昆明池遺址在今斗門鎮東南面，總面積約十平方公里。

在昆明池進行皇家園林裝飾雕塑，即在池之東西兩岸，分別建立牽牛、織女石像，乃是依據《牛郎織女》這則美好而古老的神話傳說。如班固《西都賦》說：「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三輔黃圖》卷四「漢昆明池」條，引關輔古語說：「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牽牛織女于池之東西，以像天河。」

牽牛、織女石像，採用花岡岩雕成，造型簡潔，風格古樸。牽牛石像高二五八厘米，右手曲舉，左手貼在腹前，作跽坐狀；織女像高二二八厘米，雙眉感鎖，嘴角下撇，籠袖端坐。

牛郎織女，是人民心目中熱愛勞動、忠于愛情、嚮往幸福、敢于向惡勢力及封建等級觀念作鬥爭的典型形象。漢昆明池畔的牽牛、織女石像，是我國古代較早用于園林裝飾的一組雕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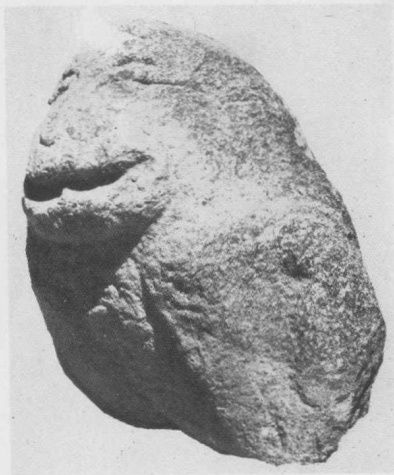
霍去病墓題銘刻石(拓本)

留存至今的另一組西漢大型石刻，是陝西省興平縣道常村西北的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墓石刻，漢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一一七年）由少府屬官「左司空」署內的優秀石匠所雕造〔二〕。

據《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記載，霍去病自幼善騎射，從元朔六年十八歲任嫖姚校尉開始，到元狩四年為止，五年之內六次率軍反擊匈奴侵擾，為解除匈奴對西漢王朝的軍事威脅，為打開通往西域的道路，建立了不朽的功勛，深受漢武帝器重，初封冠軍侯，晉封驃騎將軍。這位青年將軍，不幸於元狩六年病逝，年僅二十四歲。噩耗傳來，朝野震悼。漢武帝特地在茂陵東面不遠處，選定霍去病的墓址，「為冢像祁連山」，以紀念元狩二年霍去病在河西戰役中取得的關鍵性勝利。

現存之霍去病墓石刻，包括立馬、卧馬、躍馬、卧虎、卧象、石蛙、石魚二、野人、母牛、犛犢（舊稱怪獸喫羊）、卧牛、人與熊、野猪、石蟾等十四件。另有「左司空」、「平原樂陵宿伯牙霍巨益」題銘刻石各一件。

這批大型石刻，均用花岡岩雕成。作者運用循石造型的藝術手法，巧妙地將圓雕、浮雕、綫刻等技法融匯在一起，刻劃形像以恰到好處，足以表現客體特征為度，決不作自然主義的過多雕



西漢石蹲虎（咸陽石橋鄉出土）

鏤，從而加強了作品的整塊感與力度感，具有古樸渾厚、沉雄博大的風格特色，堪稱「漢人石刻，氣魄深沉雄大」之傑出代表。

原來錯置於墓塚周圍的各種石刻動物，烘托出霍去病戰鬥生涯的艱苦。原置於墓塚前面的《立馬》石刻，則是這項紀念碑羣雕的主體。在這件高一六八厘米的主題雕刻中，作者運用寓意手法，以一匹氣宇軒昂、傲然卓立的戰馬來象徵驃騎將軍，以戰馬將侵擾者踏翻在地的典型情節，來讚頌驃騎將軍在戰爭中建樹的奇功。其主題思想是一目了然、淺顯明確的，其表現手法却是含蓄深刻、耐人尋味的。這件作品的外輪廓，雕刻得極其準確有力，馬頭到馬背部分，作了大起大落的處理，形象極為醒目。馬腹下不作鏤空處理，既利於保持作品的整塊感，又可以加重對失敗者的鎮壓力量。《卧馬》和《躍馬》的馬頭，刻成前伸的形狀，顯得機警待命。而這匹卓立的戰馬，却特意刻成收頸垂頭姿態，既烘托了悲壯肅穆的氣氛，又便於向仰面朝天的失敗者發出嚴厲的警告，使兩者之間產生呼應關係。總之，《立馬》石刻，是思想性與藝術性完美統一的典範，是西漢紀念碑雕刻取得劃時代成就的標誌。

陝西城固漢博望侯張騫墓前的一對「石虎」，約雕造於西漢元鼎年間，雖已嚴重風化，猶存雄壯之姿。

屬於西漢時期的零星石刻，有咸陽石橋鄉引玉村出土的石蹲虎，山西安邑杜村出土的石虎，青海海晏出土的石虎座等，亦用循石造型手法刻成，與霍去病墓石刻的古樸風格相一致。西漢的小型石刻，有河北滿城劉勝墓出土的跽坐石俑，西安灊橋及興平北吳村等地出土的石虎鎮等。

「漢承秦制」，西漢前期，某些軍功顯赫的將領及受封的諸侯王，也使用陶塑兵馬俑隨葬，以炫耀其生前地位與權力。這種西漢陶塑兵馬俑，迄今已發現三批：

第一批，一九六五年秋出土於咸陽楊家灣漢墓的十一個從葬坑中，計有騎兵俑五百多件，步兵俑一千八百多件〔三〕。墓主人可能是文、景時期某位高級將領。騎兵俑高六十八厘米左右，步兵俑高約四十四至四十八厘米，製作精細，神態威武。騎兵俑與步兵俑分置於不同坑內，和秦俑坑車、步、騎諸兵種混合編隊的情況不同，騎兵在總兵力中的比重也明顯增加，展示了文、景時期騎兵有了巨大發展的狀況。

第二批，出土於咸陽東郊狼家溝漢惠帝安陵第十一號陪葬墓的從葬溝中。已清理出土八十四件，除了衆多的武士俑外，還有少量女侍俑伴出；另外還有陶塑家畜^{〔三〕}。武士俑高四十四至四十六厘米，分步兵俑與射擊俑兩類，皆敷彩。射擊俑上身向右傾側，作舉臂叉腿、投擲武器狀，姿態頗生動。

第三批，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在江蘇省徐州市東南郊獅子山西麓，發現三個埋藏彩繪陶塑兵馬俑的從葬坑，現已初步清理出兩個坑，揭露出數以千計的兵馬俑。從其造型來看，時代大致屬西漢前期。以一號坑為例，坑寬約二米許，長約二十八米，呈東西向的長方形。兵馬俑排列成四路縱隊，一律面朝西方，氣勢咄咄逼人。此坑中段，有陶馬四匹，作並轡拉車狀。武士俑分立姿與坐姿兩種，作坐姿者多數頭戴兜鍪（形狀頗似風帽）、背箭箠。估計使用這批陶塑兵馬俑隨葬的墓主人，是西漢前期封於徐州的某代楚王。此項考古新發現，生動地展示了某代楚王擁兵逞驕的面貌。

除上述出土兵馬俑外，在西安東郊姜村、長安故城遺址、興平齊家村、臨潼床單廠、河南省孟津白合、江蘇省銅山縣江山、徐州北洞山等地，還出土西漢侍女俑或舞女俑。

侍女俑以西安姜村出土的最為典型，一九六六年七月，出自竇后墓的從葬坑中，共四十二件。埋葬年代在漢武帝初年。其中，立式侍女俑眉目清秀，作擁物侍立狀；坐式侍女俑或籠袖跽坐，姿態恬靜；或微微側首，作舉臂撫琴狀。這批侍女俑，形像俊美，體態端莊，是西漢宮女的生動寫照^{〔三〕}。值得注意的是：臨潼床單廠出土的侍女俑，形貌服飾和西安姜村出土者如出一轍，故疑皆為西漢朝廷賜給貴戚之東園偶人。

舞女俑以西安白家口出土者最為優美，那柔軟的身姿，貫注的神情，飄拂的長袖，輕盈的舞步，構成了富有旋律的美感。

西漢還有成組陶俑的塑造。山東濟南無影山西漢墓出土的樂舞雜技陶俑羣，在一塊長方形陶盤上，塑造二十一個人物，中央有七名演員正在表演歌舞雜技，後方是伴奏樂隊，兩側有七名峨冠博帶的觀者。捏塑手法頗為簡練潑辣，敷彩華而不躁，出色地表現了漢代雜技表演的歡快熱烈氣氛。

總的看來，西漢陶俑多為合模製成，具有形體適中、比例適度、姿態生動、手法簡潔等特點。在人物動態塑造上，比秦俑有明顯進步，生活氣息日趨濃郁；在審美情趣上，總是力求表現高於生活的美。

西漢木雕在繼承楚、秦藝術傳統的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目前能見者，皆屬明器；多數是圓雕的偶人車馬，木版浮雕僅在江蘇盱眙東陽和揚州邗江胡場兩地西漢晚期墓中，有少量發現。

西漢前期的木俑，以長沙馬王堆、江陵鳳凰山、雲夢大墳頭漢墓出土者為代表。馬王堆漢墓出土二百六十多件，分着衣木俑和彩繪木俑兩大類，頭像雕刻得比較精緻，五官部位準確，比當地楚墓木俑更為寫實傳神^{〔三〕}。雲夢大墳頭一號墓出土的木俑，輪廓鮮明，臉面保留着刻削的稜綫，尚存楚墓木俑的古樸遺風。江陵鳳凰山一六七號墓出土一隊車仗奴婢木俑^{〔四〕}，共二十四件，包括持戟謁者俑、佇立侍女俑、荷鋤農奴俑、執斧工奴俑、駕車木馬及木輅車等，內容豐富，生活氣息較濃。這批木俑，身材頎長，軀體輪廓極富曲綫變化，衣紋具有質感，服飾彩繪鮮麗典雅，堪稱西漢初期木俑中的佳作。

西漢後期的木俑，以江蘇連雲港雲台高高頂、高郵縣天山、盱眙縣東陽、邗江縣胡場及湖南長沙楊家灣劉驕墓出土者為代表。其中，連雲港出土的抄手侍俑，高五十一厘米，體態豐盈，亭亭玉立；持盾俑表情庄重，刀法明快^{〔五〕}。邗江胡場漢墓出土兩件跽坐說唱俑，手勢生動，五官清晰，臉上流露出歡快的笑容，神態活潑，極富感染力，是西漢後期木雕藝術有了長足進步的標誌^{〔六〕}。廣州皇帝崗出土西漢晚期之木船模型，附有五名舉槳划水的船夫木俑，作片狀造型，側視效果良好^{〔七〕}。

西漢時期的銅俑，形體一般都不大，但善於刻劃特定人物的表情和動態。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兩廣地區西漢前期的幾組銅俑。廣西貴縣是漢代鬱林郡治所在地，一九八〇年秋，貴縣風流嶺三十一號墓出土的一件青銅跽坐俑，表情端肅，鑄工嚴謹。伴出的一匹青銅大馬，高約一一五厘米，姿態威武雄健；這是繼秦代銅車馬之後，西漢前期的優秀青銅雕塑，具有承前啓後的重要意義^{〔八〕}。廣西西林縣普駄粮站銅鼓墓，出土一件青銅騎馬俑和一組青銅六博四人俑，形體不及風